

散工市场中的大龄农民工有机嵌入 与“桥头”秩序*

陈 锋^{1,2} 王光普³

摘要：随着年龄增长和体能下降，相当一部分难以在常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大龄农民工进入散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以谋求生存。从对散工市场实地调查的情况看，大龄农民工基于散工工作的自由性将就业选择有机嵌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形成“半工半歇”“半城半乡”“半工半耕”的平衡，并在规避风险的过程中形成自组织化的“桥头”秩序这种主动适应散工市场的生存模式。散工市场为大龄农民工提供了退守的务工场所，使大龄农民工实现从“剩余人”向“自由人”的角色转变。对于散工市场的治理，应注重管理与服务并举，维持市场基本秩序，并为大龄农民工提供风险提示，在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给予大龄农民工及其家庭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

关键词：大龄农民工 散工 生命历程 自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2022年3月，《工人日报》一篇题为《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①。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地，出于安全考量，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纷纷发文，要求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无论政策上规定与否，当前一些在建筑工地从业多年的超龄农民工开始走上转型之路，其中一部分人流向散工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流动到城市成为农民工。散工市场就业机制灵活、就业准入门槛低，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其中使用传统零工即散工的企业占比为27.08%，散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灵活用工群体（杨伟国等，2022）。

“散工”是指农村涌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口中，既没有合法的个体经营资格，也不属于各类企业中合法受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编号：19BSH024）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①裴龙翔，2022：《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工人日报》3月18日05版。

雇者的从事零散自由工作的人(周大鸣和刘志军, 2006)。这是一个以农民工及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高双双, 2010), 是城市中的“超底层群体”(王立波, 2008)。他们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被迫进入散工市场(周建新, 2016)。散工之“散”在于无固定组织与工作单位, 是游离于正式组织体系之外的“游兵散将”。这一方面使得散工工作极不稳定, 生活处境往往较为艰难, 另一方面因缺少有效的管理极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聂娟和李超海, 2014; 姜仁良和梁程程, 2018)。近年来, 地方政府逐步强化对“马路劳务市场”的规范化管理, 通过建立正规劳务市场来缓解散工市场带来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然而一些学者发现, 治理后的正规劳务市场无人问津而散工市场仍然人满为患(刘敏和岳晓林, 2020)。为此, 开始有学者将目光投向散工市场内部的组织生态和控制结构, 讨论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何以可能, 何以有效(马子琪和张广利, 2021)。

学界从一开始对散工边缘化生存状态的描述性分析到对劳务市场“正规化”尝试的反思, 再到近年来开始关注散工市场的自发秩序, 关注散工本身。这是对这一群体学术研究日趋成熟的表现, 本质上是学术视角发生了转变。具言之, 学界不再将散工群体当成符号化的研究客体, 而是兴起真正反映散工生存状态、生存策略的实然性、主体性的研究。图海纳强调“主体”作为行动者建构自身经验的能力在生活中做出选择、参与决策所发挥的作用(转引自维沃尔卡, 2017)。散工并不仅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被动承受者, 其具体行动实践也在影响社会。比如有学者发现, 散工中的“赶货工”用隐性的方式来对抗他们认为糟糕的雇主, 如故意浪费生产资料、故意拖延交货时间或者制造生产程序的混乱来延误生产(黄岩, 2014)。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当地称之为“棒棒”)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以“忍”来消解人际冲突并建构散工身份认同感(秦洁, 2013)。以上研究提供了要充分关注散工主体性的启发, 但仍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其一是缺乏专门针对大龄散工这一群体的分析, 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有待研究。其二是散工市场作为大龄农民工重要的劳务市场, 需要纳入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视野, 如此方能理解散工工作的特性及其与大龄农民工的契合性。

散工市场上的务工者年龄普遍在40~60岁, 以中老年农民工为主。值得注意的是, 庞大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逐渐步入老年阶段, 学界对此相对缺少关注。鉴于此, 本文将散工市场中的大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 对他们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实地调查发现, 大部分农民工年龄一旦超过50岁就很难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或高强度连轴转的流水线工作。由此, 本文将50岁以上的农民工界定为大龄农民工。相较于陷入失望、怠惰、沉沦的恶性循环之中浑浑噩噩的“三和青年”(田丰和林凯玄, 2020), 大龄散工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生存面貌。他们更愿意承受单调、乏味的工作, 更吃苦耐劳, 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积极的“适应”状态。散工的务工集聚点即散工市场一般也被称为“桥头市场”(鱼琳惠等, 2017)。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在政府部门引导下, 桥头市场从城中向城郊转移。城郊相对低廉的房租也是吸引散工在此聚集并形成桥头市场的重要原因。本文关注通过桥头市场就业的大龄农民工如何适应散工角色,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析城乡中国背景下大龄农民工如何在个体与家庭之间、务工与务农之间达成平衡, 并探讨这一群体形成了怎样的“桥头”秩序。

本文研究的案例均来自笔者于2018年在内蒙古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和2019年在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共计60余天的实地调查。笔者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得一手资料。

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主要辐射本自治区范围内的散工，对于零公里桥头市场的实地调查形成了笔者基本的问题意识。而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相较前者辐射范围更大，务工者来自全国各地，为笔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散工生存样态。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位于国道与城市主干道的交汇处，北邻城郊村当铺村（全村占地面积约2100亩，现有户籍人口500户1200人，外来常住人口2580户9289人）。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北临城市主干道，东邻城郊村河南村（全村占地面积约5000亩，现有户籍人口2169户5092人，外来人口高峰时达到4万人）。本文从活跃于桥头市场的大龄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大龄农民工“散工不散”的特征，诠释演绎“桥头”秩序的运行机制，重点研究大龄农民工如何主动适应散工市场以及如何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形塑相应的抗风险机制。

二、从“剩余人”到“自由人”：大龄农民工角色的积极转变

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赴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和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开展实地调查，共访谈了44名散工，其中男性40人，女性4人，受访时年龄在50岁以上的散工有41人。有21名散工之前在电子厂、啤酒厂、钢铁厂等工厂工作。其余23人之前从事建筑业，多属于劳务派遣性质或临时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分别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做出的规定，非标准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的特殊形态在法律层面受到同等保护（刘琦，2009）。虽然有部分小作坊和工程队中仍然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但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通常会依法办理正规的用工手续。与打散工相比，在工厂上班包括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农民工的就业相对稳定^①。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大龄农民工无法继续在工厂工作或难以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从事建筑业，而被迫进入较为低端的散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以谋求生存。

案例1：秦融^②，女，出生于1972年，已婚，育有一子。她进入桥头市场前在制鞋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她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劳动强度非常大。在流水线上工作要求工人眼疾手快。随着年龄的增长，秦融逐渐体力不支。她称自己在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手控制不住地抖，眼花缭乱”，好几次因错过或弄坏零件而被罚款。她说：“累，浑身疼，岁月不饶人啊。”秦融一直坚持到还完老家的债，其儿子也高中毕业后，才离开工厂。她向一位同村的老乡寻求帮助，老乡带她到桥头市场打散工并教她学习焊工技术。她和老乡在城郊村合租，每天一大早一起到桥头市场找工作。（受访者：秦融，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19日）

案例2：常二，男，出生于1968年，已婚，育有一子。他进入桥头市场前在建筑工地做力工。常年的重体力劳动使常二患上腰肌劳损。他还因一次工地事故失去了半个小拇指指头。建筑工程普遍采

^①在实地调查的受访者中，有之前在正规工厂工作的正式工，也有之前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临时工，还存在少数几例之前的工作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总体而言，与收入水平较低、无劳动合同的散工相比，作为正式工和合同工的农民工其就业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由于年龄增长、体能下降、知识技能不足等方面的制约，这些大龄农民工逐渐被常规劳动力市场淘汰成为“剩余人”。

^②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余同。

取“包工制”的组织方式，在工程期内工人们同吃同住，等到工程结束后结算工资或者以年为单位结算工资。持久的高强度工作、恶劣的居住条件、与家人分离的孤独以及经常发生的工资拖欠，使常二离开建筑工地进入桥头市场。（受访者：常二，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5日）

由此可见，年龄增长、体能下降使得大龄农民工难以负荷高强度的流水线工作。这是他们离开工厂进入桥头市场的重要原因。而从常二的经历可以看出，大龄建筑工人不仅在体能上无法承受长时间无间歇的重体力劳动，而且年龄越大也越发难以忍受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与家人分离的痛苦，更何况建筑工地繁重且高危的工作还会导致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此外，国内建筑行业普遍存在垫资施工、非法转包与违法分包等现象，使得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任焰和贾文娟，2010）。失去体力优势的大龄建筑工人相比年轻工人更加难以承受工资被拖欠的风险。受种种不利因素制约，大龄建筑工人往往会在承受不了工作强度或工作风险时选择离开建筑工地，而桥头市场恰恰给予他们一个退守的务工场所。除了主动辞工，也有大龄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工作效率和业绩下降而被解雇的。此外，还存在大龄农民工因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缺乏适应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劳动力素质，而被“机器”淘汰的情况。可以说，大部分大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无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知识技能上都处于劣势，竞争力较为缺乏，面临被淘汰的境遇。其中相当一部分大龄农民工被常规劳动力市场淘汰后流向桥头市场，成为散工。

案例3：张斐，男，出生于1966年，已婚，育有一子。他进入桥头市场前在一家生产货运汽车的公司工作。随着年龄增长，张斐的工作效率和业绩逐渐下滑。2015年，张斐在为该公司工作了15年后被某劳务派遣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张斐的失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他在老家还有老父亲需要赡养，每个月要给他父亲寄钱。他的妻子在城市做着卖早点的小生意，收入并不稳定。他们还要供儿子读大专。失业后张斐亟须打工赚钱却举步维艰。他自己也说：“这样一把年纪哪里会要我呢？”后经老乡介绍他来到桥头市场，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了辆三轮车，做起了搬运工。前些年，张斐的儿子大专毕业并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还结婚组建了小家庭。这让张斐一下子感觉轻松了不少。他觉得自己身体尚可，与其赋闲在家，还不如来桥头市场打些日结零工，给自己挣些养老钱。他说：“我想去就去，累了就休息两三天，没人催你，不用请假。”访谈时，张斐坦言自己近期不会再来打散工了，因为要和妻子回老家照看刚出生的孙子，“现在年轻人压力大，我们做父母的能帮点就帮点，等小孙子过了一百天，我再来桥头”。（受访者：张斐，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3日）

案例4：秦三龙，男，出生于1965年，已婚，育有一女。他进入桥头市场前是某工厂的劳务派遣工。2008年，该工厂购入一批进口机器，并给工人们一周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机器，学不会的将被辞退。一周过去了，秦三龙虽然非常努力，却始终记不住机器上英文标识的意思，最终被工厂辞退。灰心丧气的他带着妻子回老家务农，这样也能方便照顾年迈的父亲。他进城打工前有过务农经历，在父亲的指导下很快就熟悉了农业生产。他农忙时节在家务农，等到农闲时也会到城郊的桥头市场找散工做。（受访者：秦三龙，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4日）

整体而言，虽然大龄农民工一开始打散工多半是被迫无奈之举，但桥头市场也为有再就业意愿的大龄农民工提供了较为灵活的就业形式和一定的择业空间，使大龄农民工实现从常规劳动力市场的“剩余人”向桥头市场的“自由人”的角色转变。具体而言，散工的“自由人”特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散工很“散”。其一是散工的职业不固定。大部分散工在进入桥头市场后从事过不同职业。由于桥头市场上各类职业从业门槛低，散工多半随着招工需求的变化而频繁更换工种。其二是散工的上工地点不固定。散工们是临时集散，获得招工信息后，哪里有用工需求就去哪里上工。其三是散工在工作和生活安排等方面拥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散工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很多搬运工都提到他们出工自由度较大，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是工作还是休息都由自己决定。

第二方面，散工爱“散”。在访谈中，散工们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散工工作的“自由”感到满意，桥头市场现金支付日清日结的付薪模式也让他们觉得踏实。之前在制鞋厂流水线上工作的秦融就表示：“桥头生活其实并不差，有时候挣得比过去工厂里还多。”张斐喜欢“桥头自由清闲，没有过去工厂里的打卡制度和周六日的加班，在等活儿的时候还可以和老乡娱乐交友”。桥头市场实行的“工资日结制”也让之前干建筑工的常二心里很踏实，这让他“能拿到付出劳动后应得的每一分钱”。可见，相较于过去在工厂或建筑工地上的打工生活，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的大龄农民工退守至桥头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后，对于打散工还是持有比较积极的态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变迁的背景下，大龄农民工受年龄增长、体能下降、知识技能不足等方面的制约成为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只得进入较为低端的散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以谋求生存。然而，这些大龄农民工不仅走出“被淘汰”的困境，在散工市场中生存适应下来，乃至形成一定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进而实现从“剩余人”的消极角色向“自由人”的积极角色的转变。

三、“自由”的散工：与大龄农民工生命历程相契合的就业形式

（一）大龄农民工适应散工工作的原因

聂娟和李超海（2014）基于劳动形态和社会保障，将“散工”群体归类为不存在劳资雇佣关系、政府管理缺场且收入水平较低的城市底层自雇就业农民工：他们主要分布在工厂之外和社区之内，从事城市生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附属配套行业，嵌入市场网络而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是被城市保障体系忽略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城市融入不足，且未被正式制度吸纳，却有着顽强的城市适应能力（周大鸣和刘志军，2006）。这种适应能力恰恰是大龄农民工基于散工工作的自由性将就业选择有机嵌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的结果。根据实地调查的经验材料，大龄农民工之所以适应散工工作，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

表1 大龄农民工适应散工工作的原因

原因类型	具体原因
健康状况	“我想去就去，累了就休息两三天，没人催你，不用请假。”（受访者：张斐，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3日）

(续表1)

	<p>“现在身体最重要，不能把自己累着，能挣点就挣点。”（受访者：秦融，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19日）</p> <p>“到工地上一般都要做9个小时，你要做满了才下班，做不完还要加班，有时候赶工连吃饭都来不及，身体会吃不消的。打散工就不会这样，都是事先在桥头就跟老板讲好了工作内容和价钱，合适了我才去。”（受访者：代建国，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4日）</p> <p>“进厂子碰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该干还得干，你还得看别人脸色行事，图个啥？干这个（散工）想什么时候出来干就什么时候出来干。”（受访者：巩军，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4日）</p> <p>“现在年纪也大了，反应也慢了，还往工地上跑，一旦出事那可怎么办。”（受访者：孟国梁，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6日）</p>
兼顾家庭	<p>“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大，我们做父母的能帮点就帮点，等小孙子过了一百天，我再来桥头。”（受访者：张斐，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3日）</p> <p>“子女上班忙，也没时间照顾孩子，我和老伴这不就来北京帮忙嘛。我这个人有点技术，也闲不住，出来给孙子挣点奶粉钱。”（受访者：胡建业，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4日）</p> <p>“我孙女上小学了，白天把她送到学校，我就在附近找点小营生，比如擦玻璃、打扫卫生这种时间短点的，因为不能耽误她放学。”（受访者：刘巧燕，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6日）</p> <p>“散工自由啊，没人管。家里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及时赶回去帮忙。”（受访者：李强，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8日）</p>
兼顾务农	<p>“我大（山西方言，指父亲）岁数也大了，身体不太好，我和妻子回老家一边务农一边照顾他。农闲的时候就来这儿打打工，额外挣点钱。”（受访者：秦三龙，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4日）</p> <p>“光种粮食不保险啊，而且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村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都来市场上站工。”（受访者：徐虎，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4日）</p> <p>“过几天我就该回东北收麦子，先不上桥头了。”（受访者：徐兵，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5日）</p> <p>“老家地太少，我种了些玉米，院前种了点菜，至少保证有吃的。挣钱主要还是来（桥头市场）打工。”（受访者：顾大龙，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6日）</p>
其他原因	<p>“我倒不是为了再挣多少钱，我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几日上桥头见老朋友们，心里就空落落的。”（受访者：老孙，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10日）</p> <p>“来桥头上跟他们打打牌，唠唠嗑，要不整天坐家里不得憋坏了。”（受访者：刘三军，访谈地点：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8年7月30日）</p> <p>“我会技术，木工瓦工都能做，而且这些年积攒了不少客户，所以我出来打散工反而比过去挣得多，没有抽成，还能接更多的单。”（受访者：张伟，访谈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访谈时间：2019年8月14日）</p>

在调查大龄农民工如何“适应”市场环境时，笔者通过对大龄农民工生命史的探寻和追溯以及一系列开放式提问来挖掘大龄农民工的认知与体验。由于大龄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性，案例材料呈现不同

的适应策略^①。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整理和归纳，从桥头生活纷繁幽微的日常模式中提炼出大龄农民工的一些核心适应机制。本文的分析嵌入生命历程视角。生命历程理论是基于对生命周期理论的反思发展而来的。生命周期理论将生命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的发展，社会关系或角色的不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包蕾萍，2005）。它将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根据其所在家庭结构和规模变化划分成不同的人生阶段。生命历程理论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性维度，吸收毕生发展观和生活史的研究，并更加注重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系。所谓生命历程，是“个体在一生中要不断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经历的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年龄层级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Elder, 1998）。生命历程理论极力寻找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它试图找到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方式，而时间性维度是寻找这种联结的重要方向。在这个理论框架中，社会的规定性和年龄的层级性是它的两个关键特点，轨迹、持续、转变是它的三个重要分析主题。在实地调查中，大龄农民工的生存策略和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在灵活就业中获得的自我满足感，蕴含着在个体、家庭与社会的互动中所达成的一定的角色平衡状态。换言之，通过桥头市场就业的大龄农民工大多达成了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与散工工作的协调与契合，并最终转化为对散工生存状态的积极认知。

（二）生命历程视角下散工工作与大龄农民工的契合性

1. 与个体生命周期相适应的“半工半歇”。大龄农民工因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成为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不支，离开工厂进入“自由零散”的桥头市场是他们生理极限下的被迫无奈，但也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与工厂中的工人相比，桥头市场上的散工对于工作、生活的安排具有较大弹性。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群农民工：他们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他们一般早上六点来到桥头市场，遇到新的招工车入场，不像其他年轻农民工那样急切地围上去咨询信息和自我推销，而是选择性地询问和比较。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心急，而是继续耐心等待或者回住处休息。他们对工作的要求不高，以身体为重，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什么时间干、去哪里干、干什么。老李^②说：“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确实大不如前，扛沙袋、搬砖比以前慢，挣口饭吃没问题，就是怕生病。现在苦活儿重活儿给再多钱我也不干，如果身体不舒服了就在家歇着。”可见，大龄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需求做一个有限理性下的抉择，如果最近身体不舒服，手头也不紧，就可以选择“休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龄农民工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享受桥头生活的

^①受访者中，有极个别大龄农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通过人脉的积累反而在桥头市场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但这样的案例在调查中极为少见。对于绝大部分缺乏劳动技能以干体力活为主的大龄农民工而言，这种情况不具有代表性，故不进一步展开详细分析。

^②老李，男，出生于1955年，已婚。他之前在水泥厂做过小工、卖过菜，后来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进入正规工厂工作了六年，又赶上企业改革，工厂引进新设备替代了传统人工。他被辞退后经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做水泥工。

“自由”，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基本完成了供孩子上学、帮孩子成家的代际任务。他们年事已高，但身体条件尚可，认为与其赋闲在家，不如出来打些零工，给自己挣些养老钱。概言之，散工工作的“自由”特性恰恰与大龄农民工个体生命周期相适应，进而形成“半工半歇”的平衡。

2.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协调的“半城半乡”。个人的生活机会不仅取决于历史环境，而且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生活机会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家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共同构筑的机会结构决定的（Elder, 1998）。因此，如果从回溯的角度来考察大龄农民工的生命史，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机会是其生命历程长期选择的结果，受一定家庭生命周期对其角色期望的影响。从外出务工到进入工厂工作，再到进入桥头市场打散工，这些较为重大的转变和选择往往与个体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和相应的角色期望息息相关。

农民工离开老家进城务工本就离不开社会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其角色期待的影响。大部分农户家庭都形成了由家庭生命周期所决定的家庭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在此模式下实现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正如张斐的案例所展现的，张斐和妻子在外打工收入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张斐的父亲在老家务农形成收入的补充渠道。结婚和孩子出生是张斐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由此张斐夫妇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在此阶段，扛起家庭的责任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他们做出任何重大选择都得考虑家庭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为家庭而奋斗构成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本体性与超越性价值。以家庭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孩子出生后，他们的生活期望和重心就会转移到下一代的成长成才上，他们会尽己所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与受教育条件。他们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所以，当张斐被工厂解雇后，他赶紧寻找工作，进入散工市场做起搬运工，为的就是能够继续承担“养家糊口”的生存任务和“供孩子上学”的代际任务。而当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后，张斐的生活重心再度发生转移。他打工的目的变成趁着身体尚可挣些养老钱，为子代分担压力。受访时张斐还坦言，自己要和妻子回老家照看刚出生的孙子。类似张斐这样的大龄农民工，他们的家庭通常处于空巢期，子女离开原生家庭后成立小家庭有了下一代。一方面，考虑到子女工作压力大，他们心疼子女照顾孩子辛苦；另一方面，儿孙满堂、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追求。因此，多数大龄农民工在这一阶段选择帮助子女照看孙子女来减轻子女的负担。一部分大龄农民工与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他们在照顾孙辈的间歇打些零工以补贴家用。还有一部分大龄农民工更加看重农村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优势——农村生活费用低廉，他们在子女需要的时候回老家务农并照看孙辈，也为在外打工的儿女提供稳定的“大后方”。

由此可以看到大龄农民工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协调的“半城半乡”工作生活模式的优势：从地点来看，位于城郊的桥头市场是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地带，为大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穿梭提供了方便；从时间来看，散工工作的自由性使得大龄农民工可以将打散工与家庭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履行家庭代际责任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务工收入，在进城与返乡之间、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好安排。

3.与农业耕作周期相契合的“半工半农”。大龄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成为城市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

“剩余人”，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返乡务农，形成“老人农业”^①的生产模式。不过，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返乡的大龄农民工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在农业劳作之外还有不少空余时间。桥头市场恰恰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兼业的可能。返乡的大龄农民工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打零工，形成“半工半农”的平衡。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的研究显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而案例4中的秦三龙年轻时外出务工，他的父亲在老家务农就是这种家计模式的体现。当秦三龙随着年龄增长以及受知识技能不足等的制约而被常规劳动力市场淘汰后，返乡务农就成为他托底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传统农村长期以来并非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费孝通，2006）。桥头市场的意义就在于，给返乡的大龄农民工提供了一个较为灵活的增收途径。大龄农民工的“半工半耕”的生存策略体现为散工工作的自由性与农业耕作周期相契合。陈军亚（2019）在对罗家坝的研究中发现，在土地产出与家庭人口的生存需求之间不能达到平衡时，村民会利用农业生产“忙闲交替”的周期特性，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尽可能使收入来源多样化。部分返乡的大龄农民工忙时务农、闲时做工，最大化拓展生存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内蒙古旱灾导致农业收成大幅度减少，而这部分“半工半农”的兼业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他们通过增加在桥头市场打零工的频率和强度获得了足以维持温饱的经济收入，甚至能够支援在城市打工的子代小家庭。可见，对于农户家庭而言，这种“小而专、专而全、全而兼”的家庭生产方式，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季节性特征所形成的对劳动用工的集中需求，还提高了农户家庭劳动力利用效率，从而拓宽了家庭收入来源渠道，增强了农户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务工务农相结合使得农户家庭能够分散风险，灵活地在外出务工与返乡务农之间转换，在保障基本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增产创收。

综上所述，散工市场就业门槛低且就业形式相对灵活，为大龄农民工提供了弹性较大的就业选择。进入散工市场后，大龄农民工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就业机会加以选择，在以身体为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挣些养老钱；他们将打散工与家庭需要结合起来，在履行家庭代际责任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务工收入，在进城与返乡之间、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好安排；返乡务农的大龄农民工在农闲时到桥头市场打零工，实现务工务农相结合，可增加收入渠道，提升家庭韧性，最大化拓展生存能力。

四、从不确定到确定：自组织化的“桥头”秩序

大龄散工尽管基于散工工作的自由性，将就业选择有机嵌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形成“半工半歇”“半城半乡”“半工半耕”的平衡，但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桥头市场上就业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对于大龄散工而言，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低，还存在依法维权难、生活条件差、被城市“边缘化”等问题。因此，如何在工作中尽量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严重侵害是大龄散工必须解决的问题。实地调查发现，大龄散工通过自组织化的“桥头”秩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散工市场上形塑相应

^①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本身就有务农的经历，在城乡收入差距的驱使下，他们年轻时选择外出务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又在年老时选择返乡务农且在农闲时兼业务工，形成半耕的“返乡务农”与半工的“散工就业”的平衡。

的抗风险机制，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一般来说，外出务工者主要有三种流动形式：有组织流动（通过正式组织落实工作）、自组织流动和无组织流动。自组织流动是大龄散工的主要流动形式，大龄散工依靠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的社会资本获得用工信息、落实工作、解决一系列生活问题。大龄散工自组织群体在组织结构上以老乡为纽带，他们一般同吃同住同劳动，具体表现为在工作中分工协作共同进退、在生活中分享家庭式的关怀和温暖、在散工市场上联合提高拉生意和维权的成功率。这些城市中“自由”的边缘人面对市场风险依靠自组织力量尽量维护自身权益。这又进一步巩固了其群体的内聚性。

（一）自组织的用工网络

散工自组织的用工网络是以老乡资源为基础的。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先行者往往会组织更多的老乡进城务工。实地调查的案例中大约有80%的散工是通过老乡介绍来到桥头市场的。散工的老乡团体在组织结构上较为紧凑严密，因为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提高打散工的效率和收益。老赵^①说：“我一般接到老板的活儿，都会叫上大家一起干，大家都是一个地方来的，互相帮助。一般来讲钱都是均分的，当然给大家提供用工信息的人往往可以多拿一点。有些工作如果要不了那么多人，大家一般就协商解决，由先接到活儿的人来定谁出工。”自组织的用工网络提供了对于散工而言极为宝贵的用工信息和工作机会。张海东和赵雅轩（2009）分析对比了正式组织、隐性组织和无组织这三种形态，研究发现，街角劳力隐性组织在利益诉求方面略弱于市场中的正式组织，却比无组织的街角劳力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这表明，对于处在市场边缘的街角劳力而言，集体性的组织方式使他们更容易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因为隐性组织意味着工种齐全的技术组合，比如工种齐全的装修队就更容易在市场上树立业务方面的知名度，这又会促进次级业务关系网的建立，从而增强街角劳力隐性组织的生存能力。

形成自组织的用工网络后，对于大部分大龄散工（在实地调查的受访者中占比约为2/3）而言，他们无需起早赶到桥头市场，只需和用工方或包工头用电话、微信提前联系好工作内容和薪酬条件，在居住的城郊村的主路旁搭车前往上工地（被散工们形容为“村里上车”）。而无组织的“单打独斗者”只能在桥头市场等待招工。可以发现，这些“村里上车”的散工具有如下优势：第一，工作关系相对稳定，有相对固定的用工方和工友；第二，更可能获得相对有利的结算方式和薪资待遇；第三，节约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这些散工形成相对固定的务工渠道后，就可省去早起到桥头市场找工作的时间，直接“村里上车”。到桥头市场等待工作机会的散工也坦言羡慕“村里上车”的散工。然而在桥头市场等工是“村里上车”的必要前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在桥头市场等待的散工，可能因为工作能力强、技术水平高，获得用工方的青睐，用工方在雇用他做完某个阶段的工程后，希望他再介绍一些踏实肯干的工友一起加入下一阶段的工程，从而降低用工方的搜寻成本。受邀的散工如果觉得可行，

^①老赵，男，出生于1963年，家在包头市青山区当铺村。老赵一开始在建筑工地从事高空作业。随着年龄增长，他工作时经常感到头晕、恶心。因身体不适，他离开建筑工地进入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当力工。老赵是经验丰富的老散工，认识很多用工单位，通常用工方都是直接打电话给老赵，让他带几个人去接活儿，酬劳在通话中就谈妥了。老赵是其所在的大龄散工群体的核心人物。

就会联系自己的老乡、工友一起去。阶段性工程完成后，这些散工或返回桥头市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或应其他工友和老乡之邀，直接“村里上车”去上工。因此，对于散工而言，要想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就要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给用工方和工友留下良好印象以寻求长期合作。正如老张^①所感叹的：“干活的时候你得表现得厚道，尽可能多干点，这样工友下次才会继续叫你。另外通过这个机会让老板赏识你也很重要，可能下次老板会直接来找你。”概言之，在桥头市场上，散工要尽可能发展工友关系和老乡关系，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随着关系网络的不断延伸和扩张，散工能够获得的用工信息、工作机会也日益增多，并逐渐从分散的个体发展为自组织群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值得一提的是，相比青壮年散工，自组织的用工网络的支持对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的大龄散工而言更为重要。

（二）自组织的社会支持

经济社会地位、行为习惯、语言文化差异以及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交往互动的屏障（熊辉，2008）。处于城市边缘的大龄散工在外务工遇到风险时倾向于依靠熟人关系网络向老乡、亲友寻求帮助。他们同工同吃同住，在生活中和工作上互相帮助，形成自组织的社会支持。

在生活中，大龄散工往往选择与老乡合租的模式，案例1中的秦融便是如此。这是大龄散工为了分摊生活成本的理性选择。老乡们共同的语言、习惯、风俗和文化以及相似的工作内容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社会交往十分密切，生活在一起也更加融洽和谐。每天凌晨五点，秦融和老乡一起到桥头市场寻找工作，而等待招工的漫长过程则是秦融与老乡闲聊和结交朋友的休闲时光。早上七点半之后，来桥头市场招工的用工方一般会迅速减少，散工们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打扑克。老唐^②直言自己非常享受这一过程，“感觉在桥头每天过得挺快乐，自由清闲，日结工资，干完活就能拿到钱，不像在工厂里面，天天上班还得打卡。我每天上桥头虽然不一定能找上活儿，但总比憋在家里强”。而且，即便在用工淡季，仍然会有很多散工相聚桥头市场，老孙^③解释说：“我倒不是为了再挣多少钱，我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几日没上桥头见老朋友们，心里就空落落的。”可见，桥头市场已经不简单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用工平台，更是一个呈现自组织化特征的散工进行精神交流的文化场域。

此外，大龄散工自组织群体内部还存在技术的传递流动。案例1中的秦融进入桥头市场时受到老乡的无私帮助，老乡还向她传授焊工技术。很多散工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或多或少获得了老乡在知

^①老张，男，出生于1968年，已婚。他年轻时是卡车司机，给一个私人老板跑运输，后因业务不景气而失业。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三轮车，在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上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其他工作老张也都接。他为人厚道，人缘较好。

^②老唐，男，出生于1968年，离婚。他早先时候在装修公司打工，后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难以继续从事工作，经亲戚介绍来到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做刮家工。

^③老孙，男，出生于1979年，已婚。他年轻时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国有商场工作。后来国有商场破产，老孙被迫进入北京市顺义区河南村桥头市场做力工。老孙很少接活，每天却必上桥头市场，为的是和几位老朋友打扑克，聊聊天。

识技能和工作经验方面的分享或传授。这种技术的传递边界一般与人际关系的边界重合，不同散工群体之间则是竞争关系，通常是无法分享这些知识技能的。他们必须对有限的知识技能在传递边界方面加以控制，以维持本群体在桥头市场上的微弱优势。

可见，自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现在大龄散工日常生活中的患难与共、精神上的相互慰藉和知识技能的内部传递等方面。在长期的相处中，他们共同分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不断强化对于老乡团体的归属感。谋生的压力和城市的排斥，反向形塑了大龄散工这一边缘化群体的内在凝聚力。

（三）自组织的维权博弈

在桥头市场上，大龄男性散工主要从事建筑家装方面的工作，如瓦工、油工、管道工、搬运工等，大龄女性散工主要从事卫生保洁等工作，也有一小部分大龄女性散工在工地做小工等辅助性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技术含量低而劳动风险高。绝大多数大龄散工都有过被“骗工”的经历，完成工作后用工方却“挑毛拣刺”，不给工资或克扣工资。因为大龄散工主要从事“临时工作”，一般不签订劳动合同，诉诸法律讨薪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大龄散工缺少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往往也索赔困难（王琦，2015）。在充满风险的市场环境中，面对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和严重缺失的社会保障，大龄散工发展出自组织的维权博弈策略。

其一是对包工头的道德评判来约束包工头的行为。对于拖欠工资或是工资、工时与事先承诺不符的包工头，散工们会在桥头市场上尽可能让他名声扫地，就如大龄散工李强^①所说，“哪个老板第一天拖欠工资，第二天整个桥头就全知道了”。在这种非正规的劳务市场中，良好的信誉和名声是包工头能招到理想工人的关键。包工头扮演的是衔接用工方与散工自组织群体的“中间角色”，他不仅要取得用工方的信任，还要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散工队伍。这些散工干活的速度和质量将直接决定包工头的薪酬和用工方对他的态度。因此，包工头与散工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包工头也要努力维系好与自组织化的散工群体中那些有威望的散工的关系，尽可能在桥头市场博得一个好名声。

其二是对“工资日结制”的坚持。十年前桥头市场上还是以按年结算或按月结算工资的“长工制”为主，按日结算工资的“日工制”并不常见。然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桥头市场上，“长工制”结算模式下散工一旦被骗，损失的将是他们辛辛苦苦打工几个月甚至几年来的工资。因此，采用“日工制”有利于最大限度降低大龄散工被“骗工”的风险，是他们在不稳定就业中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然而，建构“工资日结制”这一新的给付模式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实地调查中了解到，一开始绝大部分用工方并不同意采取这种模式，因为“日工制”下工人的流动性过强不利于用工方的管理。然而大龄散工通过组织关系网络来约束自组织群体内部达成一致来对外坚持按日付薪，并将立场摇摆的散工排斥在群体之外。一旦被边缘化便意味着散工个人不仅失去了作为自组织群体成员共享用工信息的机会，更要承受熟人关系网络破裂的风险。因此，在散工群体口径一致的争取下，部分用工企业迫于生产旺

^①李强，男，出生于1954年，已婚，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工作并成家了。李强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打工，曾有过多次被拖欠工资的经历，之后到包头市零公里桥头市场打工。为了避免身体过分劳累能做到适度休息和降低被拖欠工资的风险，他强烈支持并践行桥头市场“工资日结制”的模式。

季的巨大劳动力需求，率先采用按日付薪的结算方式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能力，完成订单。同处于市场竞争大环境下的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使得“工资日结制”成为散工市场通行规则。概言之，“工资日结制”是大龄散工自组织化维权博弈所取得的规避风险的方式。

当桥头市场这样一个缺乏政府和法律力量介入的权力真空地带出现时，大龄散工依靠熟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所联结而成的自组织，在保护个人权益、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归属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自组织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大龄散工对组织资源的渴望，这种组织支持在调整劳资分配关系和改善就业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综上，大龄散工在将就业选择有机嵌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的同时，又通过自组织化的“桥头”秩序构成对资本力量的反制，形成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性反向运动”（波兰尼，2007）。

五、结论与讨论

在当前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散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灵活用工群体（杨伟国等，2022）。本文揭示了散工市场上大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策略。既有研究大多把散工作为被动的客体研究，而缺乏真正反映其生存状态、生存策略的实然性、主体性的研究。这种“主体性”指向行动者对生存结构有所判断后所采取的具有主动性的行动。大龄农民工从“剩余人”向“自由人”角色转换的背后往往是个体、家庭与社会互构的过程，因此不应止步于单纯的制度分析，而应更加深入地考察散工市场上大龄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及其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多向度互动，从而展现各市场主体间相互交织的互动全貌。

笔者在分析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经验材料后发现，相当一部分大龄农民工受年龄增长、体能下降、知识技能不足等方面的制约成为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被动进入较为低端的散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以谋求生存。然而，这些大龄农民工不仅很快适应了散工市场的环境，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归属感和满足感，实现从消极的“剩余人”角色向积极的“自由人”角色的转变。大龄农民工基于散工工作的自由性将就业选择有机嵌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农业耕作周期，并在规避风险中形成自组织化的“桥头”秩序这种主动适应散工市场的生存模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找寻确定性。

本文并非对散工市场进行价值评判，而是以大龄农民工作为研究主体展现散工市场上大龄农民工的生存策略和对环境的适应性，进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散工韧性”。不可否认，散工市场的“自由”给了大龄农民工自我调整的空间，使其得以生成与生命历程相契合的嵌入策略和自组织策略，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吸纳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政府部门往往把散工市场视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阻碍，认为散工市场的存在不利于市容市貌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为此，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建设正规劳务市场来缓解散工市场带来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并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正规化。但正规劳务市场较高的就业门槛和雇工门槛以及存在的规范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等问题造成“有场无市”的现象（刘敏和岳晓林，2020）。这种“一刀切”正规化的治理模式忽视了散工市场的运作规律与大龄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需求，恐难以实现长效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中的散工市场不仅为难以在常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大龄农民工提供了退守的务工场所，也为大龄农民工在返乡务农之外于

农闲时外出打零工创收提供了可能,进而形成“半工半歇”“半城半乡”“半工半耕”的平衡。因此,对于散工市场的治理,应注重管理与服务并举,维持市场基本秩序,并为大龄农民工提供风险提示,在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给予大龄农民工及其家庭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

参考文献

- 1.包蕾萍,2005:《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120-133页、第244-245页。
- 2.陈军亚,2019:《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82-99页、第201页。
- 3.费孝通,2006:《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1页。
- 4.高双双,2010:《当前我国散工社会状况及应对措施》,《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0期,第32-33页。
- 5.黄岩,2014:《都市里的赶货工》,《中国工人》第9期,第41-43页。
- 6.姜仁良、梁程程,2018:《基于博弈论视角的马路劳务市场治理探讨》,《天津商业大学学报》第2期,第15-21页。
- 7.卡尔·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5-48页。
- 8.刘敏、岳晓林,2020:《“有市无场”与“有场无市”:马路劳务市场及其治理困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38-47页。
- 9.刘琦,2009:《劳动法视角下我国非正规就业者的权利保障》,《湖湘论坛》第4期,第104-108页。
- 10.马子琪、张广利,2021:《马路劳务市场的组织生态与控制机制——基于Z市的实证调查》,《青年研究》第6期,第83-90页、第93页。
- 11.米歇尔·维沃尔卡,2017:《社会学前沿九讲》,王鲲、黄君艳、章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5页。
- 12.聂娟、李超海,2014:《“散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治理——以广州的实地调查为例》,《学术研究》第12期,第45-50页。
- 13.秦洁,2013:《“忍”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对重庆“棒棒”城市生活心态的深度访谈》,《开放时代》第3期,第153-167页。
- 14.任焰、贾文娟,2010:《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第12期,第5-23页。
- 15.田丰、林凯玄,2020:《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北京:海豚出版社,第159-174页。
- 16.王立波,2008:《一个边界状态的劳动力市场——以沈阳“马路市场”为个案》,《青年研究》第4期,第36-43页。
- 17.王琦,2015:《城镇化中散工就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失与完善》,《学术界》第11期,第223-231页、第328页。
- 18.夏柱智、贺雪峰,2017:《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117-137页、第207-208页。
- 19.熊辉,2008:《群体偏见、污名化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民族论坛》第3期,第41-43页。
- 20.杨伟国、吴清军、张建国、汪建华、陈雯、熊贇、万钺宏,2022:《灵活用工类型的比较》,载杨伟国等(著)《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20-154页。

- 21.鱼琳惠、王芳、刘玲, 2017: 《非正规就业集聚点空间现象研究——以呼和浩特市桥头市场为例》,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第4期, 第72-78页。
- 22.张海东、赵雅轩, 2009: 《隐性组织化: 街角劳力的边缘化生存逻辑》, 《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第194-200页。
- 23.周大鸣、刘志军, 2006: 《杭州市散工研究报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0期, 第1-5页。
- 24.周建新, 2016: 《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散工的现实状况与学理分析》,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35-42页。
- 25.Elder, G., 1998,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69(1):1-12.

(作者单位: ¹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²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

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责任编辑: 王 藻)

The Organic Embeddedness and “Bridgehead” Order of the Aged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asual Market

CHEN Feng WANG Guangpu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age and decline of physical strength,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older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difficult to find jobs in the conventional labor market enter the casual labor market to seek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survive.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casual labor market, the older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freedom of casual work, tend to combine employment choices with their individual life cycle, family life cycle and agricultural farming cycle, forming a balance of “half work and half rest”, “half city and half countryside” as well as “half work and half farming”, and forming a self-organized “bridgehead”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avoiding risks. The casual labor market provides a retreat place for the older migrant workers, enabling them to realize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rplus person” to “a free person”.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casual labor market, there is a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both management and service, maintain the basic market order, and provide risk reminders for the older migrant workers. While protect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the olde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more space for independent choices.

Key Words: Older Migrant Worker; Casual Worker; Life Course; Self-organization